



晚清、民国词风演进历程及其反思

朱惠国

摘要：晚清至民国，中国词学经历了三次重大变化：第一次是常州词派的崛起，第二次是朱彊村主盟词坛以及梦窗热的形成，第三次是西学对中国传统词学的影响，并进而推动中国词学现代化转型的最后完成。三次词风之变，体现了不同社会形态以及不同发展阶段对传统文学的要求与影响，同时又清晰勾画出中国词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晚清民国；词风演进；常州词派；朱彊村；现代化转型

晚清至民国时期，伴随中国社会的巨变，传统词的创作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期间词学风气一变再变，体现了不同社会形态以及不同发展阶段对传统文学的要求与影响。尽管这一转变主要发生在清末民初，但其缘起以及后续影响则明显超出这一时限。因此，本文以清末民初为重点，考察上起清嘉道年间，下至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三次词学风气的变化。探究其形成原因、转换过程以及词学史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准确地描画出这一时期传统词创作以及词学观念的演化轨迹和发展趋势。

一、常州词派的崛起

本时期第一次词风转换是常州词派取代浙西词派，使词学创作重新回到质实、重功利的轨道上来。关于这次词风变化已经有无数词学研究者作了清晰而详尽的描述与阐释，无须在此赘言，但有三点一直为人忽视，权作补充。

其一，此次词风转换肇始于嘉道年间，但转换的主体部分发生在晚清时期。一般人认为，张惠言是常州词派的创始人，因此常州词派理所当然地形成于嘉庆时期。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张惠言的《词选序》固然是常州词派的理论基础，但该序文在当时词坛的影响非常有限。有学者曾指出，张惠言在世时，常州词派并无影响，该派真正在词坛形成气候，要到周济时期；并以为，人们只是在常州词派全盛时溯源，才发现并“追尊”张惠言^①，这一说法基本符合实际。可以这样认为，张惠言在世时，常州词派作为一个词学流派并未形成。常州词派真正形成，并在词坛取代浙西词派的主流地位，应是在道光后期。因为周济虽然出生于乾隆四十六年，但前半生主要是以豪士、侠客的面貌出现^②。作为一个著名词学家，他主要的词学活动是在寓居金陵春水园以后。据魏源《荆溪周君保绪传》：“（周济）‘寓金陵之春水园。时道光八年也，年四十七。’”^③他最重要的两部词学著作《宋四家词选》和《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均成于道光十二年，此时已 51 岁。周济自称：“余少嗜此，中更

① 详见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第 471～472 页。

② 详见拙文《豪士 侠客 文人——晚清词学大家周济》，载《文史知识》2007 年第 10 期。

③ 《荆溪周君保绪传》，载《魏源集》，中华书局 1976 年，第 364 页。

三变，年逾五十，始识康庄。”^①这一选一论，代表了周济比较成熟的词学思想，也集中体现了早期常州词派的主要理论。考虑到这两部词学论著从传播出去到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均需一段不短的时间。因此常州词派理论体系形成，并在主流词坛形成风气，至少是在道光十二年（1832）以后较长的一段时间。以此推算，本时期第一次词风转换的完成，应当是在晚清时期。

其二，常州词派本质上是常州学派通经致用观点在词学领域里的一种延伸，是儒家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具体表现。该派之所以能在晚清时期盛行，主要是词派核心理论与当时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与清词发展的内在需求相一致，而并非理论本身的先进性。从文艺学的角度看，常州词派理论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正是这种局限性，导致了晚清及民国词创作成就的相对低下。因此，对于这次词风的转换，必须作全面、客观的评估。

学界在分析常州词派取代浙西派的原因时，比较通行的看法是清词自身演化的结果。这种观点的源头最早可追溯到张德瀛的“三变说”。张德瀛以为：“愚谓本朝词亦有三变：国初朱、陈角立，有曹实庵、成容若、顾梁汾、梁棠村、李秋锦诸人以羽翼之，尽祛有明积弊，此一变也。樊榭崛起，约情敛体，世称大宗，此二变也。茗柯开山采铜，创常州一派，又得恽子居、李申耆诸人以衍其绪，此三变也。”^②至于这第三变的内在原因，普遍认为是匡救浙派末流的空疏。金应珪曾以“三蔽”概括常州词派产生前的词坛状况，即淫词、鄙词、游词，以为张惠言编《词选》，阐述词的政教功能，其目的就是匡救词坛积弊，指明作词的正确方向。我们认为，清词演化的自身规律，的确是常州词派在晚清盛行的重要原因，但除此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常州词派理论与晚清社会发展趋势的高度契合。

常州词派产生于清政府开始转衰时期，政治的巨大阴影直接投射在词派之上，因此词派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涉世与实用。词派的核心理论，如词史论、比兴寄托论等都是围绕词的政教作用展开。一般而言，这种偏于实用功能的词派或其他文学流派，往往伴随某种社会思潮产生，但能否风行则并非取决于自身。它们是社会政治间接的产物，因此其生命力与社会政治息息相关；一旦社会发展的轨迹发生变化，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消失，它们的生命也就走到尽头。从这一角度讲，常州词派能否风行，主要取决于张惠言、周济以后的社会环境。常州词派的幸运在于它的产生、发展与社会演化的步调保持一致。张惠言死于嘉庆七年（1802），周济死于道光十九年（1839），这一时期是常州词派的孕育与形成期，也是清政府各种社会矛盾的积聚与显现期。道光十九年以后，清政府内外矛盾开始激化，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此后的太平天国运动更是两次集中爆发。可以这样说，从常州词派孕育的嘉道时期到中国传统词学现代化转型基本完成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百年是中国历史上动荡最激烈、变化最巨大的非常时期。常州词派伴随着中国历史一起走完这一段痛苦而又艰难的路程。时代是决定文学发展走向的基本要素，嘉道以后动荡的社会决定了这一时期的词学只能是一种担负社会责任的词学，一种重功利的词学。常州词派产生于社会欲变未变时期，其核心理论正为可能出现的世象而设计；而以后历史的演化又恰好印证这种设计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常州词派的理论完全契合了社会的发展趋势。这是常州词派能在近代中国迅猛发展的最根本原因。

客观上讲，常州词派的产生的确扭转了当时不良的创作风气，使词的创作重新回到重视社会功能的轨道上来，满足了清词发展与社会政治的双重需求。从这一角度看，常州词派功不可没。但是，事物总有两面性，常州词派在纠正浙派之弊，给词坛带来一种清新词风的同时，也暴露了自身的弱点。由于常州词派是一个重功利的词派，过于强调词的政教功能，因此在创作过程中十分讲究寄托的手法，要求表达微言大义，这又在客观上弱化了词的抒情功能，与词的体裁特点相背。或许这就是常州词派在晚清，乃至民国初风行一时，却又无法在创作上取得较高成就的主要原因。从长远看，这种理论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词的审美功能，不利于词体本身的健康发展。因此，我们在肯定常州词派成功转换词学风气的同时，对其理论的局限性也要有清醒的认识。

①《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载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646页。

②张德瀛：《词征》卷六，载《词话丛编》，第4184页。

其三,常州词派占据词坛主流地位以后,浙西词派并没有从词坛彻底消失,成为一个历史概念。相反,在整个晚清时期,浙西词派与常州词派长期共存,并表现出相互交融的趋势。在理论倡导方面,常州词派作为新兴的词派,其影响力明显压倒浙西派,但在词的创作实践上,两派差不多势均力敌。

现在很多人,包括一些学者都有一个认识误区,以为常州词派与浙西词派是一个简单的取代过程,随着常州词派的兴起,浙西词派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显然,这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我们认为,常浙两派在词学主张以及创作风貌上固然不同,甚至对立,但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对词体功能的理解上,对不同美学趣味的追求上,他们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单一选择,更不是你死我活的生死之争,而是两种不同理论主张与创作风格的差异,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和互补性。常州词派产生之初,由于负有纠浙派末流之弊的责任,比较强调词的社会功能,因此常浙两派的联系与互补并不明显,更多的是一种竞争与取代。但随着常州词派自身弱点的逐渐暴露,词坛自动作了调整,以浙补常,两者更多的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晚清民初词坛对王沂孙、姜夔等词人的重新重视就是一个有力证据。当然,这种互补是以常州词派为主的,毕竟它是一种主流词学。

晚清词坛常浙两派共存与交融的现象表现在理论倡导与创作实际两个方面。就理论而言,孙麟趾、黄燮清、沈祥龙等人的词学观念都明显地表现出浙派的特征,即使是被认为是常派理论家的谢章铤,其理论体系中也明显有一些浙派的因素,表现出融合常浙的倾向。至于不以派标榜,自成门户的刘熙载,更是融合常、浙两家的理论精髓,形成独特的“厚而清”词学观。而在创作实践中,浙派的影响尤其大。一般认为,嘉道以后最有成就的词人当数蒋春霖,而蒋春霖词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清丽、骚雅,颇具浙派之遗风。蒋春霖的好友、词论家杜文澜就以为“(蒋春霖)性好长短句,专主清空,摹神两宋”^①。当然,也有人认为蒋春霖属于常派,主要理由是其词反映了当时的战乱,具有社会价值。我们认为鹿潭词清丽凄苦,是典型的浙派风格,至于内容反映现实,并非就是属于常派的理由,其它词派的词也可以表现现实,只不过常派更强调寄托的手法罢了。除了蒋春霖,周之琦的创作也取得较高成就。周之琦的词风总体上是境界幽美,凄婉多情,既重韵律之美,又强调意蕴,同样带有不少浙派的风格特征。目前,对周之琦的词风仍有争议,有人以为偏常,有人以为偏浙,但从艺术风格看,无疑更近于浙。当然也有学者取比较折中的说法,以为“盖之琦之词托体甚高,曲折顿宕,意致深纯。浙西常州之外,居然一大家也”^②。钱仲联先生在《清词三百首》中也持相似观点,认为周之琦非浙非常,自成一家。但不管怎么说,周之琦受浙派影响颇深是可以肯定的。可见,浙派在当时词坛依然具有强大的实际影响力,并没有退出词坛。

二、朱祖谋主盟词坛与梦窗热的形成

本时期第二次词风转变是常州词派及其理论自身的演变,其标志就是朱祖谋的主盟词坛以及梦窗热的形成。常州词派开始由关注社会转为更多地关注词艺,词学风气乃至词学观念在事实上发生变换。

关于此次词风转变目前学界并没有明确的断论,但关于朱祖谋以及梦窗热的现象已经为许多词学研究者所关注。较早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的是龙榆生,他于1941年在《同声月刊》上发表《晚近词风之转变》一文,对王鹏运、朱祖谋时期的词坛及其新的词学风气专门进行讨论。他首先认为王鹏运与朱祖谋是这一时期的开风气人物,所谓“晚近词坛之中心人物,世共推王半塘(鹏运)、朱彊邨两先生,而风气之造成,则《薇省同声集》,实推首唱,而《庚子秋词》之作,影响亦深。”并明确将两人归为常州词派,以为“晚近词坛之悉为常州所笼罩也”。在分析当时词风形成的原因时,着重指出两点,一是大背景“逊清末叶,内忧外患,岌岌可危,士大夫于感愤之余,寄情声律,缠绵悱恻,自然骚辨之遗”。另一是小环境,“鼎革以还,遗民流寓于津沪间”。至于词坛新风气的具体表现,主要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恒借填词以抒其黍离、麦秀之感,词心之酝酿,突过前贤”。其二是“彊村先生益务恢弘声家之伟业,网罗善本,从事校刊唐、宋、金、元人词,以成《彊村丛书》”^③,并在当时词坛形成一时风气。龙先生这段话表明他已经看到了晚清

①杜文澜:《憩园词话》卷四,载《词话丛编》,第2922页。

②《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6卷,齐鲁书社1996年,第626页。

③《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380~382页。

民初词风的变化,以为此种词风不仅与清词整体风貌有别,且与张惠言、周济时期的常州词派也不同。这段话比较客观地指出了晚清民初词风新特点,表现了龙先生的学术敏感性。但龙先生将王鹏运、朱祖谋共同视为这种新词风的代表人物,并将这一时段划得很长,从晚清一直划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朱祖谋逝世,则并非很妥。

我们认为,王鹏运和朱祖谋尽管有密切联系,但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时期的不同词风。王鹏运可以视为传统常州词派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他的理论以及创作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常州词派的基本特点。龙榆生提到的《薇省同声集》和《庚子秋词》虽然与张惠言、周济时期的创作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主要是创作环境的差异。从词人对词的理解以及创作的主体风貌看,王鹏运与前期常州词派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很难得出词风转换的结论。

真正引领词坛风气转换的是朱祖谋。朱祖谋的词学活动大致可分为前后两段。前段与王鹏运联系比较紧密,创作上也有相同之处,所谓“士大夫于感愤之余,寄情声律,缠绵悱恻,自然骚辨之遗”。另外他的校词经历,也起始于这一时期与王鹏运的合校梦窗词。但由于年辈和声望的关系,影响明显不如王鹏运。这时段的朱祖谋只是以王鹏运为首的词人群体中的一个,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风格与影响力。后段才是真正的“彊村时代”。1904年王鹏运去世,朱祖谋成了词坛的核心人物。从清朝灭亡直到1931年朱祖谋去世,他以遗老身份主持词坛,并以自己的词学活动影响了词风的变化。

这种变化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首先从创作上看,虽然有“借填词以抒其黍离、麦秀之感”的遗民心态,但这种心态随时间的推移也在渐渐淡化。词人的关注重点明显由词心转向词艺。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词已经退出主流文学样式的行列,更多地染上私人化色彩,其关注社会、干预社会的功能已经退化。作词在当时或是一种个体化的情感寄托方式,或是一种文人雅士的文化休闲方式,或是一种以文人雅集为形式的群体化鉴赏与交流活动,如当时的词社。虽然从作者角度看,仍然会用词的形式表达某种私人感情甚至社会情绪,其中比较明显的是遗老的黍离之悲和灵魂难以安顿的失落之感,但从社会普通读者的角度看,已经较少地通过词的阅读去感受时下的社会生活。因此就词的创作活动而言,其艺术因素渐趋加强而社会因素慢慢消减。随举一例,作为前清遗老的朱祖谋曾主持民国时期的春音词社和讴社,但这两个词社的成员构成比较多元化,并没有太多的遗老色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南社成员也多次参加春音词社和讴社的唱和活动,而南社在成立之初是明显有反清倾向的。可见词社的创作活动并没有太浓的政治色彩,大家的关注点主要是在词艺的切磋乃至唱和活动本身的风雅。朱祖谋在当时经常给后辈传授词艺,但没有刻意用遗老情绪去影响后人。反过来说,不少新一代词人和词学家,如龙榆生、夏承焘等,都曾向朱祖谋请教过词艺,但基本没有受到他遗老色彩的影响。显然,当时的风气已经与《庚子秋词》时期有了很大的变化。

其次,从词学活动看,朱祖谋时期更重视词集的校勘和声律的研究,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梦窗热”的形成。关于晚清民初的“梦窗热”,已有学者作了十分详细的论述,不再赘言。我们感兴趣的是“梦窗热”出现的时间、背景和本质。考朱祖谋一生四校梦窗词,时间分别是1899年之前(与王鹏运合校)、1908年、1913年和1931年,后三次都是在他1906年“以病乞解职,卜居吴门”之后,其时朱祖谋的政治热情已经消退,主观上有远离政治中心的想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09年宣统“特诏征召”而“未赴”。作为词学活动上的反映就是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纯粹技术性的校勘活动中。除了校梦窗词以外,他还校了《东坡乐府》等几十种词集。据马兴荣先生所作《朱孝藏年谱》,朱祖谋除了1899年首校梦窗词和1900年校周密《草窗词》外,所校几十种词籍基本上都是在1906年之后,尤其是在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显然,他的校词既是一种整理与保存资料的词学活动,也是一种遗老的处世方式和生活行为。由于朱祖谋在词坛的地位,也由于其校词的心态和方式在当时具有一定代表性,他的行为在当时形成一时风气,如龙榆生所言,“一时词流,如郑大鹤(文焯)、况夔笙、张沚莼(上龢)、曹君直(元忠)、吴伯宛(昌绶)诸君,咸集吴下,而新建夏映庵(敬观)、钱塘张孟劬(尔田),稍稍后起,亦各以倚声之学,互相切摩,或参究源流,或比勘声律,或致力于清真之探讨,或从事梦窗之宣扬,而大鹤之于清真,弘扬尤力,批校之本,至再至

三,一时有‘清真教’之雅谑焉。”^①当然,在这些声律探讨与校勘活动中,对梦窗词的校勘与研究是最为有名的。以至“梦窗由平行的诸家数中的一家,而迥然拔于诸家之上,吸引了校勘家、注释家、谱牒家和鉴赏家的特别注意,由此导引一时词学潮流。”^②钱仲联先生在他的《清词三百首前言》里提出“彊村派”的概念,并以为“这派的中心领袖是朱祖谋,影响从清末直到民国二十年以至朱的身后”,其着眼点也在此。钱先生以为“朱氏门弟子众多,宣传标榜,其声势超过了‘常州派’”^③。显然是将“彊村派”视为新的词学流派。关于此观点尚可进一步探讨,但至少可以说明此时的常州词派的确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此次词风转变的原因有多种,但最主要的一点是词派领袖人物与主要成员的社会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之前他们是社会的主要参与者,无论在身份的认同上,还是在情感的倾向上,都与统治集团一致。因此希望用词的形式有补于世,体现词人的社会责任与词的社会价值。他们强调词要涉世,强调比兴寄托,要求用词来表现社会生活和时代情绪,所谓“诗有史,词亦有史”^④,无不体现这一点。但进入民国后,他们被排挤出主流社会,客观上成了边缘化群体,只能用局外人的眼光来打量世界,其心态也由外张转为内敛,由积极变为消极。就词学活动而言,除了用词的形式抒发遗民的情绪或其它私人化感情外,无法也不愿用词的形式来参与社会政治,更不会强调用词来有补于世。事实上,这个“世”已经与他们不太相关了。于是他们对词的关注由其社会功能转向审美功能与资料价值,将更多的精力用到词籍的校勘与词艺的切磋上。从某种程度上说,整理词集与切磋词艺已经成了他们日常消遣行为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种避世的方式了。民国时期的梦窗热,其本质大抵如此。

由于常州词派的这种变化是在词派内部发生的,是隐性的,因此不大容易被人察觉,这就是较少有人注意到此次词风转换的主要原因。我们现在很难用几句话说明清楚此次词风变化的利弊得失,但就常州词派本身而言,则是一种理论上的自我否定:词派由否定浙派末流出发,最后又重新回到与浙派末流相近的方向,尽管两者在表现形式上是不同的。

三、西学东渐与中国词学的现代化转型

本时期第三次词风变化起始于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完成于朱彊村去世后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其本质是外来文化影响下新型词学观念的形成。无论是持续时间、变化的方式,还是最后完成的标志,都显得比较特殊。从时间上看,此次词风之变差不多与本时期第二次词风变化同时开始,但转变的最后完成却要到三十年代,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或者这样说,此次词风之变与本时期第二次词风变化基本上是一种平行的关系,只不过是两个不同的词人群体内分别进行。当朱祖谋他们醉心于编校词籍,切磋词艺时,以王国维、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型词学家及其词学观念已经在文学界产生影响,两者按各自的线路同时向前发展,只是一家源自传统词学本身,易被词人接受,形成当时词坛的主流,另一家则主要来自传统词学界之外,被认为是“体制外”的,较难影响主流词坛。因此从清末到三十年代初,中国词坛基本上都以“彊村派”的活动为中心,形成一时风气。只有到朱祖谋去世,传统词学家的影响力有所削弱,新一代词学家逐步适应新的文艺观念,加之胡适有强大的个人影响力,融合西学的新型词学才开始影响主流词坛,并最终被主流词坛所吸收,完成中国词学的现代化转换。

关于此次词风的变化,以往学界也有所关注,但大多重头不重尾,重点不重线。所谓重头不重尾,就是比较多地关注王国维、梁启超两人在词学界开新风气的作用,如一般词学史著作往往将两人视为词学新时代的开始,但对两人词学思想的实际影响力以及最终的词学史作用缺乏必要的关注。所谓重点不重线,就是着重阐释两人的词学思想,尤其是王国维以“境界说”为核心的词学思想,但忽视两人的持续影响力,没有梳理他们之后的词学演化过程,也没将胡适的词学活动视为他们所开创的词学风气的一种延伸。

①《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382页。

②彭玉平:《朱祖谋与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梦窗词研究》,载《词学》第15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2页。

③钱仲联:《清词三百首》,岳麓书社1992年,第7页。

④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载《词话丛编》,第1630页。

事实上,王国维和梁启超的词学理论并非孤立产生,从本质上讲,都是西方文艺思想对中国传统词学的一种渗透与影响。无论是王国维注重文艺本身特性的词学观还是梁启超注重社会学功能的词学观,都含有用西方文艺理论重新审视传统词学的特性。如果再往大处看,其实是西学东渐在词学领域的一种体现。晚清时期,随着国门的洞开,西学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就文学而言,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戏剧,都受到西方文艺思想的冲击,出现一系列的变革,即使是传统文学样式中受西方文艺思潮影响较小,表现一直比较稳定的词,在创作上也多少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当时曾有不少在题材、词语以及意象选用上都与传统词有很大差异的新潮词,这些词或写华洋杂处的上海风情,如高骊的一些作品,或写世事,如秋瑾的一些作品,或咏“地火”、“电线”、“马车”、“轮船”等新生事物,如晚清民初报刊上刊载的一些作品。因此王国维和梁启超的词学理论某种程度上与这些作品一样,都是传统文学面对社会变化的一种正常反应,体现了一种新的风尚。这点在梁启超的词学理论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但是与小说、戏剧、诗歌不同的是,词学领域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这种变化都没有得到充分发育,更没有形成一种本质上的变革。就创作而言,上述所谓的新潮词本来比例就很小,而且一般不为传统词人所认可,作者主要是一些记者、编辑、留洋学生、驻外使者等,作品也主要发表在一些新式报刊上,基本没有影响到词的传统风貌。就理论而言,王国维、梁启超之后,再没出现有影响的同类词论家,相反,从《人间词话》到《清真先生遗事》,王国维对自己的观点倒是有所修正。至于词学领域为何没有像小说、戏剧、诗歌那样,最终引起变革,其原因比较复杂,有待专文讨论,但这一事实是比较清楚的。也就是说,王国维、梁启超之后,后续的理论呼应比较微弱。两人尽管开了一种新的风气,但并没有完成主流词坛风气的转换。这也就是晚清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依然以彊村派为中心的主要原因。

这种情况直到1927年胡适出版《词选》以及1931年彊村去世才得到改变。胡适的词学观从微观上看,确实与王国维、梁启超不同,他主要是推崇苏辛一派,倡导一种刚健、明朗的词学风气,但从宏观上看,同样是一种融合西学要素的词学思想。这种词学观既是新文化思想在词学领域里的一种延伸,也是王、梁两人所开创新词风的一种后响。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王国维和梁启超只是开启一种新的风气,那么这种风气最终在中国词坛真正产生影响,并形成气候,是从胡适开始的。之前较少有人看到这一点,其原因主要是胡适向来被认为是体制外词学家,其观点往往不为传统词学家所重视与认可,加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过分褒扬“豪放派”,贬抑“婉约派”,造成学界反感,以至引发八十年代以后对胡适词学观以及所推崇的“豪放派”矫枉过正的排斥。事实上,以胡适的影响力以及在文化界的特殊地位,的确推动了当时词坛风气的变化。龙榆生先生并不同意胡适的一些具体的词学观点,但客观描述了这种变化:“自胡适之先生《词选》出,而中等学校学生,始稍稍注意于词;学校中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书为圭臬;其权威之大,殆驾任何词选而上之。”^①又说:“近人胡适辑《词选》,独标白话……其在现代文学界中,影响颇大。”^②从龙先生的两段话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这样两个事实:其一:胡适的《词选》以及通过《词选》所表现出来的词学观念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力,甚至连以前对古代文学关注不多的中学生也开始“稍稍注意于词”;其二,这种影响主要是在普及的层面,但对于词学研究层面也产生一定的冲击,龙先生说“学校中之教授词学者,亦几全奉此书为圭臬”,虽主要指中学,但考虑到二三十年代中国高校纷纷开设词学课程,并且学校中词社林立的事实,也可能影响一些高等学校。而从当时词学研究界的人员组成情况看,高等学校及部分中等学校教师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这些教师的词学观点,必然会影响到当时的词学研究。由此也可见胡适词学观的实际影响力。

由于此次词风转换由并非专业词家的胡适先生所倡导,首先在社会文化层面发动,然后再影响到专业学术圈,因此呈现出由外而内的特征。与之前两次词风转换情况相比,有两个比较明显的不同:其一是社会影响比较大。之前两次词风转换基本上都限于词学界内部,倡导者和参与者主要是专业词家,社会知名度与影响力都比较有限,因此总体上没有引起太大的社会反响。而这次词风变化由新文化领袖

① 龙榆生:《论贺方回词质胡适之先生》,载《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304页。

② 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载《龙榆生词学论文集》,第99页。

人物倡导,主要在普及层面进行,社会反响非常大。其二是影响的持续时间比较长。前两次词风转换所产生的影响力主要在一个时段,一般随着社会形态变化或者词坛参与者变更而逐渐式微,而此次词风的变化不仅对二三十年代的词坛直接产生冲击,余波还一直持续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有意思的是,五六十年代一方面对胡适个人持否定态度,一方面又几乎全盘接受了他的词学思想;如果有兴趣翻看一下当时发行量最大的词的选本以及文学史教科书,这一点是相当明显的。

此次词风变化的词学史意义,有两点比较突出:首先是终结了中国词坛持续多年的梦窗热,并对传统词学形成有效冲击。胡适词学观产生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当时词坛从晚清一直持续到民国初的梦窗热。胡适批判梦窗词,将梦窗词风作为革除的对象,其初衷并非单纯地从词学着眼,而是出于新文化运动的需要。他要建立一种白话的、平民化的文学,因此把他看来是晦涩难懂的梦窗词视为批判的靶子,为建立新的文学扫清道路。但由于当时朱彊村在词坛依然有十分强大的影响力,胡适的努力在传统词坛内部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尽管就全国而言,新文学运动取得了胜利,但词学界内部却依然保持着对梦窗词的高度热情。直到胡适《词选》出版,其推崇苏辛,提倡清新刚健词风的词学观才开始影响词坛,加之彊村与其他一些传统词学家相继过世,词坛的风气有所改变。虽然对梦窗的研究并未就此完全终结,但作为晚清以来的一种梦窗热,则基本结束。与此相应,传统词学的影响力也受到明显削弱。三十年代以后,无论是词学研究的方式、视角、手段、还是基本的学术观念、成果形式、传播方法等,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是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是一种社会合力的推动,但胡适的影响力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要素。其次是由外而内地影响中国词学,并推动中国现代词学的最终形成。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朱祖谋、况周颐等老一辈词学家逐渐淡出词坛和胡适等新文学提倡者涉足词学,中国词学研究格局有了新的变化,词学家清晰地表现出三种大体的类型:其一是传统词学家,我们称之为“由内而内”的词学家。其二是以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为代表的现代词学家,我们称之为“内外兼修”的词学家。其三就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新型词学家,我们称之为“由外而内”的词学家^①。中国词学现代化转换的任务,最终是在第二类词学家手中完成的。但在这过程中,从王国维、梁启超开始,至胡适完成的第三次词风的转换,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二类词学家从学问根底来说,继承传统的东西多一点,如龙榆生一般被认为是朱彊村的入室弟子,朱氏授砚于他,曾被传为一段佳话,夏、唐两先生也有很好的词学师承。但三人均出生于20世纪初,接受的基本上是新式教育,王、梁开启的词学风气对他们多少会有影响,至于胡适的词学活动是否也对他们产生作用,有待进一步考察,但至少为他们走上主流词坛扫清了一些障碍。因此当他们继承传统词学的精华,又融合西学的观念、方法,创造一种新的词学时,总体表现得比较顺利。显然,在中国现代词学的产生过程中,前有王国维、梁启超的引导,后有胡适的推动,他们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四、结 论

追溯晚清到民国的三次词风之变,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词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化的发展轨迹。在此过程中,有三个现象值得引起关注与探讨。

其一,中国传统词学具有强大的自我调节功能,这种调节功能使其保持足够的生命力和对不同环境的适应能力,并使其长期得以生存与发展。纵观整个清代以及民国词风的变迁,其实就是传统词学不断适应环境,调节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嘉道时期,社会矛盾开始积聚,浙派末流空疏的理论难以适应新的时代,于是常州词派质实的理论应时而生,并取得迅猛发展,成为一时主流,充分表现了传统词学调节自我、顺应世事的能力。当清朝灭亡、封建时代终结时,传统词学也适时应变,在保持常州词派基本理论特征的前提下,从外向变为内敛,由高亢转为低沉,并在词艺的探讨和词籍的校勘上投入较多精力。即便面临西学东渐以及新文化的巨大冲击,也能调节自我,融合新学,并成功转型。与小说、戏剧等不同,中国现代词学理论并非脱离传统而由西方引进,并非在西方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融合中国要素,而是始终

^① 详见拙著《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第10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以中国传统词学理论为主体,在此基础上融入西方文艺理论的观念和方法,因此是一种本土化的文艺理论,与传统词学保持着嫡亲母子的血缘关系。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较多,但中国传统词学的自我调节功能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条。

其二,词学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不可能与社会的变动完全重合,但从大的方面看,词学应时而变,两者的发展轨迹基本上保持一致。从晚清到民国,词学经历三次比较大的变化,这三次变化都与社会的变动相呼应,但在具体的时间节点上又有差异,体现出词学发展自身的节奏与规律。三次变化,第一次缘起于嘉道时期,完成于晚清,而中国社会用以划分古代与近代的时间点是1840年,即道光20年的中英鸦片战争,此后清政府日益衰弱,社会矛盾迅速积聚。显然词学的变化要早一些,表明词学以及词学家对社会十分敏感。第二次变化也是如此,从词学本身来说,1904年王鹏运去世和1931年朱祖谋去世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这一时段朱彊村主盟词坛,词学呈现出后封建时代的特征,遗民情绪与去社会化倾向均比较明显。而从社会变革的角度看,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两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前者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时代,后者成为划分中国近代与现代的分界线。显然词学依然要比社会变化反应快。第三次变化则有所不同。梁启超、王国维的词学活动主要是在清末民初,其中王氏1908年底在《国粹学报》上连载《人间词话》是一个重要事件,表明一种新的词学风气正在开始提倡。王、梁之后,新派词学家中缺乏有足够影响力的词家。直到胡适1927年发表《词选》,才再次形成对传统词坛的冲击。整个过程,大约从世纪初持续到30年代初。而从相应的社会事件看,西学东渐的思潮早就开始冲击中国文化界,即便是清朝政府大规模的洋务运动,也远早于词坛的变化。可见传统词学对中国社会本身的变化比较敏感,而对外来文化的反应相对滞后。但总体上看,它与社会政治、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是一致的。

其三,传统词学与融合西学的新词学在一段时间内呈现出一主一次、双线并进的态势,两者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出现交融的趋势,而其相交点则标志着中国传统词学现代化转换的最后完成。所谓双线,一条是中国传统词学的发展趋势线,如上所述,这始终是一条发展的主线;另一条则是西学对中国传统词学逐渐渗透、形成影响的趋势线,梁启超、王国维、胡适是这条线上的三个突出点。从清末民初到30年代初,两条线索同时存在,并形成相互影响的态势。如胡适持一种比较新的词学观点,但其词学根底则来自传统学问;胡先骕持一种比较传统的词学观点,但其词学思想又明显受西学影响,两人还一度展开论战。这种情况在其它词学家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代表中国新型词学的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等人主要继承传统词学的精华,但在成长过程中又受到西学的影响,已经表现出两条线索交融的趋势,而新文化运动和胡适发表《词选》的冲击波,无疑是促进融合的强大推动力。但与小说、戏剧等其他文学样式不同,融合过程中,传统词学始终占据着主动地位。因此中国现代词学是以传统词学为主体,并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是中国现代词学的一大特色。

●作者简介:朱惠国,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241。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09YJA751028);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07BYW003);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B404)

●责任编辑:何坤翁

